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陈潭 / 主编

信任的度量：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Measurement of Trust:
Empirical Study on Political Trust of Macau Residents*

熊美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陈 潭 / 主编

信任的度量：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Measurement of Trust:
Empirical Study on Political Trust of Macau Residents*

熊美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任的度量: 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 熊美娟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61-7843-0

I. ①信… II. ①熊… III. ①市民—政治—研究—澳门 IV. ①D67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752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46 千字
定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创新团队“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与
管理”资助项目。

《南国公共管理文库》



组编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出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术委员会

顾问：夏书章（中山大学）

主任：徐俊忠（广州大学）

委员：（按音序排列）

蔡立辉（暨南大学）

陈昌贵（中山大学）

陈振明（厦门大学）

陈 潭（广州大学）

董江爱（山西大学）

郭小聪（中山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林尚立（复旦大学）

倪世雄（复旦大学）

吴逢时（香港中文大学）

吴先明（武汉大学）

沈丁立（复旦大学）

童 星（南京大学）

徐湘林（北京大学）

薛 澜（清华大学）

姚先国（浙江大学）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

岳经纶（中山大学）

张其学（广州大学）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

周敏凯（同济大学）

朱光磊（南开大学）

曹 蓉（西北大学）

陈社英（佩斯大学）

陈 光（西南交通大学）

丁 煌（武汉大学）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何高潮（中山大学）

李 强（清华大学）

马 骏（中山大学）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吴克昌（华南理工大学）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

肖 滨（中山大学）

徐晓林（华中科技大学）

严 强（南京大学）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张凤阳（南京大学）

张应强（华中科技大学）

钟书华（华中科技大学）

周志忍（北京大学）

朱仁显（厦门大学）

编辑委员会

主任：陈潭

委员：(按音序排列)

丁魁礼	韩和元	蒋红军	李小军	李智	刘波
刘建义	刘晓洋	刘雪明	彭铭刚	沈本秋	汤秀娟
王枫云	王琳	王霞	肖生福	谢建社	谢俊贵
谢志焜	熊美娟	徐凌	杨芳	曾小军	钟育三
周利敏	周凌霄				

总序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随着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创造和运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势不可当！

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对于知识、技术、制度、文化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而知识的积累、传播、生产、更新和创造也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流动性的时代里，时代赋予了每一个人同等的使命、机遇和挑战，而每一个人又是这个时代忠实的观察者、参与者和记录者。站在这个时代的横断面上，作为时代最好的记录者之一，当下学术人必须捍卫真理、秉持操守，必须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必须淡泊名利、勇于担当，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和专业的视角全部或部分地反映变革时代所涌现的人和事，总结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践活动经验，跟进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时代变革行为。

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于《心之力》的作文中写道：“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可见，学术人的学术研究只有“承前启后”、“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和“彻底研究”，才能“布真理于天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问题意识、分析技能、批判精神是学术人从事学术活动和走上职业化道路必备的三个要素。倘若缺乏了分析技能，自然也就缺乏对这个时代良好的判断能力、辨析能力和推理能力；倘若没有了批

判精神，也就无从谈起否定、反思和修正，就更无从说起创新和创造了。但是，如果没有了问题意识，那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问题意识是时代的主题，是从事学术活动最起码的思维和思考方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思维的起点，没有问题的思维显然是肤浅的、被动的。实际上，在既有的研究、思考和行文中，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落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三段论”范式之中：到哪儿去发现问题和寻找问题？怎样诊断问题和分析问题？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我们知道，学术人从事的学术研究永远都脱离不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永远都无法摆脱时代和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至于如何去“发现问题”和“回答问题”，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无论是不同学科，还是不同学派；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发现解释，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和解决方案。但几乎同一的问题意识始终是学术人无法绕过的学术“自留地”，而围绕问题所达成的目标始终又几乎都是统一的。不管是晚睡还是早起，学术人始终都是全天候地思考并想象着的“孤独的探索者”。

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从业者，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基础。公共管理研究离不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知识支撑，也离不开数学、哲学、法学、史学的思维支持。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实践活动，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公共问题，单一的学科知识已经无法圆满回答涉及面广、跨越度大、复杂性高、系统性强的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公共治理问题。因此，学科边界和知识壁垒不得被打破，科际整合成为现实，社会科学的知识统一无法避免。如今，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跨界行动，让我们目不暇接，单一的、传统的思维、专业和学科迟早会被颠覆。如果没有广博知识的涉猎和多学科方法的介入，公共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没有宽度、深度和新度。

同时，作为社会科学事业的公共管理研究，如果没有生动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作为基础，任何研究都将走向空泛和无力。实践既是客观世界的直接活动，也是主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可谓“实践出真知”。明代理学名宦林希元有云：“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作为直面实践的学问，公共管理研究既不能“坐井观天”，又不能“闭门造

车”，它必须以实践阅历与经验累积作为起码的思维铺垫和行动指南。它既需要“眼观六路”，又需要“耳听八方”，它既需要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又需要深入政府、学校、医院、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当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访谈和体验，开展案例、数据和其他有用信息的收集、鉴别与整理，才能采用“真方法”找到“真问题”。无法“顶天”，就得“立地”，唯有建立理论与经验的现实链接，学术研究才有洞察力、说服力和生命力！

众所周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毫无疑问，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国强民富、国泰民安、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不二选择。作为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涵盖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个层次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凸显了政权管理者向政权所有者负责并被问责的重要性，强调了政权所有者、政权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多种力量协同共治的必要性，指向了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普遍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与建立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善治”或“有效治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诚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冲击着既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挑战着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将会促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因此，深入开展公共治理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第一，科学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防止市场失灵。因此，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需要改革政府治理结构、完善现代政

府制度，需要明晰科学合理的政府边界，适当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第二，创新有序的地方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从纵向治理结构来看，作为一个巨型的治理共同体，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复杂性，国家治理需要地方性知识的累积，国家治理的创新需要地方治理的制度试验和“先行先试”。从横向治理结构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分治”的现实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制度“瓶颈”，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等、不便利仍然是割裂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目标。

第三，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面对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矛盾凸显和利益格局调整，政府依靠自己的力量且沿用传统的社会管制方式已经过时，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水平势所必然。因此，政府必须立足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建立顺畅的民意诉求通道，协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政府服务购买方式，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解决好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第四，开放包容的文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条件。基于宗教、信仰、风俗、道德、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范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财富的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上层建筑和“软实力”。通过进行公共文化决策、公共文化事务处理、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等形式和方式，文化治理可以平衡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需求，可以有效

地建构公共符号、凝聚公众情感、陶冶公众情操、消解心理压力、疏导社会情绪。国家文化治理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开展，也可以以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方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创新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第五，和谐共生的生态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治理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展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关系公众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毫无疑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智慧而有策略的顶层设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社会公正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普惠的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义务和福利；二是差异的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先天禀赋和后天能力的差异，社会应该为弱势者提供一定程度的照顾和补偿。通俗地说，“满足多数，保护少数”的国家治理能够达成社会最基本的“权”、“利”和“善”，能让公众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让社会公正又和谐地运转。为此，新时期的国家治理改革必须从原先的“从下至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单项突破”转变为“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平行推进、重点突破”，选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刮骨疗毒”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障碍和阻力，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与此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学术人的公共责任和学术作为。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力学术，具备学院水准、时代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学术人的学术修为、知识供给和理论贡献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为此，当下学术人必须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必须拓展学术开放度和学术自主性，必须具备国际化视野、专业化精神和本土化路线，从科学理论中寻找本土的现实注脚，从本土素材中提炼理论的科学养分，

回归常识，累积个案，追寻真实，积极推动原创研究、微观研究、深度研究的开展。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站在南海边上的中国，我们尽情地展示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稚嫩。我们深知，在学术的道路上，我们仅仅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只有站在前人和他人的肩膀上，才会看得更清、更高、更远！真心期待《南国公共管理文库》的编辑和出版能够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是为序！

陈潭

2014年2月24日

于广州大学城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 1

第二节 相关文献评述 / 7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40

第一节 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40

第二节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实证假设 / 45

第三节 研究变量的测量 / 53

第三章 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现状 & 解读 / 63

第一节 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现状 / 63

第二节 解读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直接测量的结果 / 67

第三节 解读澳门居民对四类机构、对象的政治信任 / 79

第四节 解读澳门居民政治信任间接测量的结果 / 92

第四章 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 98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 / 98

第二节 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 / 111

第三节 人口特征与政治信任 / 118

第四节 政治卷入与政治信任 / 125

第五章 政治信任两种测量的比较与分析 / 131

第一节 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及分析 / 131

第二节 对四种类型机构、人员信任的分析 / 138

第三节 政治信任的间接测量及分析 / 143

第四节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的比较分析 / 147

第五节 政治信任两种测量的比较和解读 / 157

第六章 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166

第一节 政治参与及分类 / 166

第二节 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的相关分析 / 176

第三节 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政治效能 / 180

第四节 政治参与各途径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 / 189

第七章 研究发现、讨论与建议 / 195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195

第二节 讨论与建议 / 203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 212

参考文献 / 215

附录 / 235

后记 / 243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政治系统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家对公民的看法，公民对官员的想法，以及公民感到他的影响力是有成效的、能被官员所回应的程度等。而政治信任作为信任的一种形式，一般定义为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它探究了公民对政治系统的看法和想法。因此，政治信任不仅有助于政治稳定和发展，也可以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①，使政府运作更为顺利。同时，我们也可以将政治信任视为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晴雨表”、政治制度表现的“温度计”。为此，研究一个地区的政治信任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本书以 2010 年对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了两种方式测量政治信任，描述并分析了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现状，同时也探讨了影响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和理论解释路径，并对政治信任的这两种测量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用定量研究方法厘清政治信任对不同类别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内容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对澳门这样一个地区进行政治信任的研究非常有意义。澳门作为“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地，自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1999 年 12 月 20 日，葡萄牙结束对澳门的行政管理，政

^① 周汝江、高钊翔：《话语的张力：政治信任流失——从“山寨文化”说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西侧，由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和路氹城四部分组成，在总面积共 32.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 50 余万人，这使澳门成为全球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澳门人享有“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享有当地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此外，特别行政区还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

在澳门，《基本法》设计的政治模式是一种以行政(或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制度组织形式，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的混合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基本上分而立之，但行政长官的地位显得特别突出和超然，有点类似总统制中的总统。和 1999 年回归前相比，主权和治权统一，澳门居民享有更大的民主参与权利。

回顾澳门的历史，可以看到，葡萄牙人 16 世纪中叶抵澳后，最初是和当地华人共处分治，建立了内部的自治组织——议事会，直到 18 世纪末，开始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并于 19 世纪中下叶全面控制了澳门的管治权。一百多年来，虽然葡萄牙当局对澳门的华人社会采取了若干特殊政策和措施，但绝大多数华人一直生活在建制之外。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①1974 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后，澳门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1976 年《澳门组织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为澳门回归前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而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继续源源不断向澳门输入技术官僚，从而令本地化了的制度依然由葡萄牙人操作。此外，澳门居民，特别是华裔居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程度也不高，市民在各决议机关的代表性及其影响政策的能力都很有限，市民的意愿难以完全得到反映。当时的澳门，总督不是由选民推举也无须向立法会负责，而立法会也并非是一个百分之百

^① 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1 页。